

那些“竹子扎根”的岁月

1979年秋,16岁的王振国背着简单的行囊,走进山东中医学院的校门。彼时,高考恢复不久,校园里满是求知若渴的面庞。

在学校,讲授《中医各家学说》的张志远教授给了他极大震撼。“张老号称‘活词典’,上课不用讲稿,随便一个中医话题,他都能滔滔不绝讲上几个小时,引经据典,如数家珍。”王振国至今记得,张志远教授谈论历代医家学术思想时的神采。“那时才知道,中医不只是把脉开方,背后还有这么深厚的文献积淀和学术传承。”

王振国毕业时,报考了张志远的研究生。1984年,他跟着老师开始南北东西的调研之旅。“我们走了很多地方,拜访老中医,搜集民间医案,那段经历让我对中医学术流派有了直观认识。”

王振国说,老师常说历代医家的学术思想都藏在文献里,不读透典籍,就不成了好中医。这句话,像一颗种子,在他心里扎下了根。

毕业后,王振国留校工作。1987年,该校获批两个博士点,一年只招两个博士生。王振国抓住机会,报考了徐国仟教授中医医史文献的博士研究生。简而言之,这个专业一方面是研究中医学术史,另一方面是做中医古籍整理研究。

徐国仟是北京四大名医之一施今墨的弟子,也是山东中医药高等教育的开拓者,不仅医术精湛,而且重视文献整理,著有《黄帝内经素问白话解》和《伤寒论讲义》。“徐老告诉我们,文献是中医的基础之基础,没有文献传承,中医理论和临床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王振国逐渐明确了方向。“张教授带我走进学术流派的大门,徐教授让我深耕文献研究的土壤。”博士毕业时,他自然而然地选择了从事中医医史文献研究,而彼时的他未曾想到,这条路会那么艰难坎坷。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中医医史文献研究的低谷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同仁涌向临床,毕竟“看病能挣钱,文献研究既冷门又清贫”,许多高校的相关机构也被撤销。

山东中医药学院的“薪火”虽然保留了下来,但学科课时少,没项目,只能艰难生存。整个研究所十几个人,每年会议费总共2000块钱,平均每人每年不到200块。“十年都轮不上一个人出去开开会”,回忆起那段艰难岁月,王振国苦笑说。

没钱出去,就闷在图书馆里看书,写论文。那时没有电脑检索,所有资料要靠手工查阅,他每天泡在图书馆,一页一页地抄录,整理,写下大量读书笔记。王振国说:“就像竹子扎根,虽然表面看不到生长,但地下的根系一直在蔓延。”

有人劝他:“振国,你医术也不差,去干临床早成名医了,何必守着这个冷门学科。”王振国也曾犹疑,但每次翻起老师们留下的手稿和著作,想到他们的嘱托,就又冷静了。“老一代开辟的基业不能在我们手里断了,得把这份传承扛起来。”

坐惯了“冷板凳”,他养成了沉心静气做学问的习惯。许多关于中医学说和文献整理的论文,就是在那段岁月里完成的。“机遇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要是那时放弃,就没有后来的一切了。”他感慨道。



平地起高楼拿到“国字号”

转机悄然出现,“学院”升格为“大学”后,学校决定冲击国家重点学科,而中医医史文献成为“种子选手”。30多岁的王振国,意外被推到了学科带头人的位置。“我刚刚入门,学科是什么都还搞不明白,校长说‘你年轻,就你了,带头往前冲’,我只能硬着头皮上。”

当时评选国家重点学科,申报者一般要先拥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重点学科资质,而王振国团队却“一穷二白”。很多人觉得他们是异想天开,根本不可能成功。时任校长王新陆却力排众议:“我们没有,但我们可以争取。”

为了备战申报,学校组建了一支由20多位教授组成的“智囊团”,对王振国进行全方位训练。“汇报时间只有10分钟,每句话都要精准到位,既要讲清优势,又要突出特色。”王振国每天都要进行模拟汇报,教授们从站姿、表情、语气到用词,逐一提出修改意见。“有时一句话改十几遍,每个手势都要反复练习,持续了一个月。那段时间压力特别大,但成长很快。”

答辩当天,王新陆亲自担任助手,为王振国翻幻灯片。“那时没有普及PPT,答辩用的是幻灯机和塑料胶片,需要手动更换。”王振国回忆,校长当助手,这在全国学科申报中绝无仅有。

前期的充分准备加上出奇制胜的汇报方式,让申报获得了成功。“平地起高楼,一下子拿下了国家重点学科,而且全国当时总共只有两个中医医史文献的国家重点学科。”王振国至今记得,答辩结束后,专家们评价:“没想到山东的中医医史文献研究做得这么扎实,有传承、有特色、有潜力。”

有了“国字号”牌子,团队获得了省市和学校的大力支持,在人才培养、科研立项等方面都有了重大突破。而这段经历,也让王振国深刻体会到:“有时候,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只要坚持下去,就可能创造奇迹。”

2006年,王振国跟着校领导去北京出差,一个偶然的“蹭会”经历,让中医学学术流派这一小众研究领域成为全国热门话题。

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王振国：守典籍之根 传岐黄薪火

□ 本报记者 张九龙

济南冬天的暖阳,穿过山东中医药大学校园,照进图书馆七层的文献展示区。书架上,一摞摞厚重的古籍校本、学术专著整齐排列,《圣济总录校注》《齐鲁医派文库》等成果的扉页上,都印着一个熟悉的名字——王振国。

站在展柜前,他的指尖轻轻掠过书脊,仿佛在触碰一段段沉睡的历史。“这些典籍是中医的根,我们这代人,就是要守好这个根。”岐黄学者、山东中医药大学教授王振国说。



当时会议主题是中医学学术特色与优势如何发挥,校领导因临时有其他事务处理,便让王振国代为出席。“我抱着学习心态去的,没想到居然还要发言。”轮到王振国时,他结合自己近期的研究,大胆提出:“从历史经验看,中医学学术流派是推动学术发展的重要力量。现在中医院校统一的教学体系、教材和临床模式,淡化了中医的特色与优势。”

何谓中医学学术流派?王振国解释说,中医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各地用药,发病特征不同,理论也有区别和创新。比如广东常用五指毛桃,山东则多用地黄、阿胶,南方针对湿热,北方针对寒症,这些都是学术流派的特色。”

这一观点得到了与会人员的认同。不久,全国第一个中医学学术流派研究项目就落户在了山东中医药大学。王振国带领团队,用了近两年时间走遍全国,调研各地学术流派传承和文献支撑情况,打捞出部鲜活的中医学术史,并提交了详细的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

2009年,他提出的政策建议被有关部门采纳;2011年,中医学学术流派传承人国家行业规划;2012年,国家投入1亿多元支持全国中医学学术流派传承工作室建设。“从一个偶然的发言到推动全国性的工作,这是我没想到的。”王振国说,这也让他更加坚信,研究不是闭门造车,而是要服务于临床,服务于中医的发展。

与此同时,齐鲁大地自古名医辈出,却一直没有得到系统整理和总结。“全国终于开始重视流派研究,咱自己怎么能落后?”王振国说。

于是,他又开始牵头推动齐鲁医派研究。“我们组织团队,搜集整理历代齐鲁医家的著作、医案,调研民间传承情况,总结齐鲁医派的特点和优势。”2024年,《齐鲁医派文库》正式出版,这套包含十几部著作的大部头,成为齐鲁医派研究的标志性文献。

这些成果,十年磨一剑。王振国说:“做学术研究不能急功近利,尤其是中医流派研究,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沉淀,才能真正把根挖深,把特色凸显出来。”

手抄《易筋经》引出大项目

2010年,中医古籍整理工作座谈会在福建召开,王振国又一次抓住了机遇,这次同样充满戏剧性。

会议期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系王振国,听说山东有本珍贵的《易筋经》古籍,想请他帮忙复印一份。可他跑到山东省图书馆一瞧,那本书属于文物级,不能复印,拍照只允许拍六页。

这难不倒王振国。他回去找出竖格稿纸,按照古籍原貌,用繁体字一笔一画抄录下来,装订好寄回北京。“手抄古籍是家常便饭,没啥麻烦的。”回忆起来,他淡淡一笑。

没想到,这份专业、靠谱和执行力,打动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正巧,该局计划进行中医古籍整理,有4000万元专项经费。“后来,问起我整理一本古籍需要多少钱,我说10万块钱。于是,局里立项整理400种中医古籍,项目设立办公室,我被任命为办公室主任,牵头项目实施。”王振国回忆。

这是天大的好消息,但他深知,工作难度超乎想象。“经过多年的冷落,很多人都改行了,全国懂中医古籍整理的人寥寥无几。”当被问及三年能否完成时,王振国直言,“三年肯定不行,五年也很困难,关键是缺人。”

于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决定,人才培养也由项目办公室负责。吃了“定心丸”,他牵头制订了详细计划:先在全国九个省选拔七个课题组,然后进行系统培训。“古籍整理有其行业门槛,尤其是中医古籍,涉及很多特殊术语和用药知识,不能按照文史类古籍的标准来。”

从2010年立项到2018年完成,这项“中医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建设”国家公共卫生资金项目,整整用了八年时间。“我们学校自

承担了70种古籍的整理任务,同时还要组织全国330多种古籍整理负责人的培训,包括版本调研、书稿审定等工作。”王振国说,那几年,他几乎每天都在超负荷工作,“既要抓自己团队的整理质量,又要协调全国的工作,经常开会到深夜,节假日也很少休息。”

中医古籍整理的难点,远超人想象。首先是术语的变化,汉代的词汇发展到唐代,内涵可能就变了,比如“痧症”,清代之前指的是传染病,现在却成了刮痧的“痧”。其次是地域差异,南北用药不同,同一味药在不同地区名称可能不一样。另外,还有一些中医词汇,其他领域不用,需要专门考证。比如“割”字,在中医炮制中是切成小段的意思,属于专有名词,而文史类古籍整理者会统改成“铍”字,这在中医古籍中绝不能改,否则就改变了用药方式,可是人命关天的事。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王振国联合众多专家和机构,制定了《中医古籍整理规范》。“过去古籍整理都是个人行为,没有统一的标准,我们借鉴文史界的经验,结合中医特殊性,反复修改完善,形成了大家公认的规范,作为培训的基础教材。”

最让王振国难忘的是《圣济总录》的校注工作。这部由宋徽宗赵佶主持编撰的宋代三大方书之一,将近300万字,版本有几十种,整理难度极大。“我们从2003年开始整理,一直到2018年才完成,耗时15年。”这部书是宋代以前中医学术的大成之作,涉及很多疑难问题。团队经常开会争论,一个词、一个字地推敲,每天对着屏幕修改稿子,大家眼睛都熬红了。

2015年,第一批120种古籍整理完成;2018年,400种古籍全部完成。项目成果总计8000多万字,所涉及的古籍均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未整理出版过的重要医书。这些努力,不仅抢救了一大批濒临失传的中医古籍,也为中医传承提供了文献支撑。

与此同时,项目还为全国培养了一批中医古籍整理的后备人才。“从2018年开始,我们每年至少组织一次全国性培训,邀请专家授课。”统计显示,这些年全国发表的相关论文,其作者很多接受过相关培训或项目支持。

通过这项工作,山东中医药大学在全国中医古籍整理领域的学术地位基本确立。“后来,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最系统的中医药古籍整理保护计划项目《中华医藏》学术办公室挂靠我校,由我们负责培训和学术把关,这是极大的认可。”王振国表示。

如今,该校中医医史文献团队里,不仅有中医人才,还有科学技术史人才。“这个学科本身是交叉学科,需要历史学、文献学等多学科支撑。”王振国说,年轻人才带来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让研究更有深度和广度。

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的健康观念、养生观念、治疗经验都是通过文献不断积累传承下来的。世界上很多传统医学都已断层,唯有中医传承不断,这离不开文献的支撑。“文献学是为人作嫁衣的工作,我们整理的典籍,谁都可以用,这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一项功德无量的工作。”王振国说。

窗外的阳光透过玻璃,洒在一本本典籍上,也洒在王振国的身上。他知道,中医医史文献研究的道路还很长,但只要有人坚守,只要薪火不息,这束光芒就会一直照亮未来。正如他常说的:“文献是根,文脉是魂,守住了根,留住了魂,中医才能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强的生命力。”



王振国及团队的部分出版成果

面孔



杨磊：

重塑历史剧美学标准

由杨磊担任总导演、董哲编剧的历史题材电视剧《太平年》正在热播。这是杨磊继剧版《三体》之后又一部高品质爆款作品。从科幻题材跨界到古装历史正剧,充分展现了他的导演才华以及对不同题材的驾驭能力。

《太平年》由白宇、周雨彤、朱亚文等实力演员演绎,讲述在纷争割据、社会动荡的五代末年至北宋初期,吴越国君主钱弘俶一路成长,内除奸臣,外御强敌,并于北宋太平兴国三年“纳土归宋”,助力实现天下太平的历史故事。“《太平年》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聚焦五代十国历史。”杨磊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段动荡分裂时期,可即便身处乱世,每个人都对太平充满向往。”该剧所阐发的中华文明中“太平是人民夙愿”的核心内涵,也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

《太平年》中的历史人物、典章制度、礼仪手势、饮食习惯皆有翔实的历史考证支撑,堪称一场中国历史文化与传统美学的沉浸式巡礼。杨磊坚持采用8K技术拍摄,打破了电视剧的固有范式:剧中战争铁蹄所踏之处,尘土飞扬颗粒尽显,刀刃划破官袍,纤维断裂肉眼可辨,灯光、妆发、道具等一切流程皆因技术升级而极致化。

“历史正剧回来了!”《太平年》所带来的情感共振、审美享受征服了很多观众。这部剧已成为全网热议的文化事件,年轻观众自发去杭州保俶塔献花纪念,掀起五代十国历史热,它所激荡的波澜远超剧集本身。



双雪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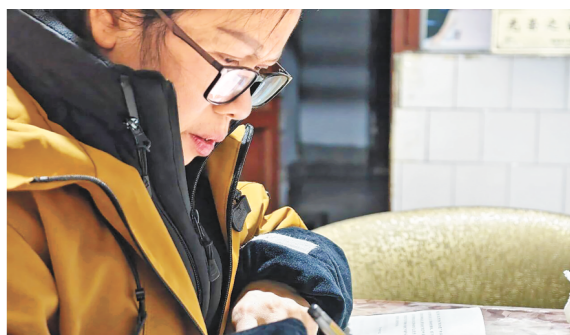
让东北叙事绽放银幕

近日,改编自作家双雪涛作品的两部电影《飞行家》《我的朋友安德烈》同步上映,引发了广泛关注。这两部影片延续小说风格,以独特的东北叙事视角,将东北地域文化、社会变迁以及人性的复杂多面生动地呈现在大银幕上。

双雪涛身兼原著作者、编剧与监制三重身份参与电影《飞行家》,为观众带来一个小人物逐梦飞行、勇敢反击命运的故事,尽显东北人独特的幽默和笑对人生的态度。在吉林长白山取景拍摄的《我的朋友安德烈》,是董子健的导演首作,勾勒出20世纪90年代东北工业小城的青春群体画卷。

作为“东北文艺复兴”的作家代表,双雪涛已有多部小说被搬上银幕,《刺杀小说家》系列口碑票房双丰收,电影《平原上的火焰》与剧版《平原上的摩西》也深受观众喜爱。双雪涛笔下的东北,既有衰败工厂的苍凉与阴郁,也有市井生活的烟火气;既有时代洪流下另类人物的挣扎,也散发着东北人骨子里的坚韧与温情。这种真实立体的东北叙事风格,为影视改编注入了独特的魅力。

双雪涛属于“新东北作家群”,他一直在书写东北工业城市中劳动者的命运。“我并不是只写东北。我只是借用东北的一些素材,来写人和人性。”他说,小说永远代替不了历史,他的小说是个人的精神史,而不是真正生活的历史。



“祝薪雁”：

书写平凡日子里的诗意

近日,“祝薪雁”频登热搜。56岁的她在寻常日子里,过出了诗意的生活,被网友热情地称为“诗意嬢嬢”。

“祝薪雁”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的一位普通嬢嬢为自己取的网名。她曾在广东的鞋厂、陶瓷厂打工多年,回到家乡后,凭借勤劳开小店营生。孩子上大学后,她拿起手机拍自己的生活,拿起笔写自己的故事。陪伴90岁的母亲吃面条,她说:“她碗里还剩大半,可每夹起一筷子面条都嚼得喷香,我瞧着这模样,心里乐滋滋的。”她写吃饺子:“饺子齐齐的,思念长长的,妈妈叨叨的。”热闹宴席中,她感叹:“人凑得齐,看着闹,心里却空得慌。”她描写豆腐:“筷子翻豆腐,焦痕漫开,像未说的话生了斑。”这些日常生活的记录,因充满温情和诗意而照进了人心里最柔软角落,浸润了无数疲惫的心灵。

与网络上无数的新大众文艺创作者一样,“祝薪雁”以朴素真挚的情感和贴近生活的表达而受到关注。“嬢嬢的文字,像冬天的暖阳”“原来平凡日子可以这么美”,近60万粉丝,通过“祝薪雁”发现了寻常生活的美好。

生活粗粝却热腾腾,文字平淡中见真情。“真实地活出自己”,恰似一股温暖而坚定的力量。“祝薪雁”说:“往后我还是会守着自己的小日子,晨起买菜,灯下写字,不辜负每一份善意,也不辜负每一个愿意看我文字的你。”(□记者 师文静)